

行进中国·精彩故事

新民图表 制图 戴佳嘉

跨越70年的重逢

寻找相片中的“豆豆”

“来到中国参战前,我对中国人民充满了同情和支持”,这是战后很多年,拉森写在自己回忆录里的一段话。

刚到中国时,拉森是一个 20 岁的愣头青,“从小我就相信,只要在地上挖一个很深很深的洞,就可以到中国了,中国在地球的另一端。”除此之外,他对于中国的了解仅限于美国媒体对于“卢沟桥事变”的报道。

入伍前,拉森是波士顿大学文学院的一年级新生,1944 年春,拉森在接受短暂的军训和摄影技术培训后,跟随美国陆军航空队来到中国昆明,加入陈纳德将军领导的第 14 航空队,随身带着的还有一部当时使用最新彩色胶片的柯达相机(Kodak Bantam Camera)。

“那时我十分渴望参战,因为 1941 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引发所有美国人的愤怒,当时我就想要加入空军痛击日军,但没有到参军的年龄。”

一抵达昆明空军基地,拉森就跑到飞机跑道上,站在一架鼻翼上绘着鲨鱼图案的 P-40 战斗机旁拍照,“我至今还记得那个令人兴奋的时刻。”

加入第 14 航空队后,拉森被派到第 2 照相勘测中队,他的工作是为飞越驼峰航线的飞行员测绘航空地图。相机是他形影不离的伙伴,工作中他用来执行空中拍摄任务,空闲时,他和战友威廉·迪伯(William L. Dibble)一起,拍摄当时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

初到中国,昆明的一切对于拉森都是新鲜的,他拍摄滇池大观楼前的游人;拍摄插秧的农民;拍摄洗衣服的农妇和嬉闹的孩子。

1944 年底到 1945 年,在太平洋战场上,中美盟军反攻正酣。战争进入尾声,破碎的生活正在慢慢恢复,这也给拉森另一种视角去记录

这是一个由一张老照片引出的温暖故事,经当事人同意后由本报独家报道。

1944 年 9 月,20 岁的美国小伙拉森(H.Allen Larsen)到中国援华抗战,加入陈纳德将军领导的第 14 航空队(原飞虎队)。一年后在重庆,拉森与中国老百姓一起迎接二战胜利,并且与一位可爱的中国女孩合影。

当时中国社会的细节:瘦小的中国人怎么能不用机械就能锯木?新娘子为什么要用红布蒙住脑袋被人抬着走?

1945 年 8 月 6 日,拉森告别服役近一年的昆明,跟着部队来到重庆,10 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到处欢天喜地,拉森有了更多时间去记录庆祝胜利的中国人。

在重庆驻地白市驿空军基地的基地医院附近,他见到了一个穿着白裙子、扎着羊角辫的中国女孩,并且让威廉帮自己和女孩拍了合影。“我只知道这个小不点小名叫‘Doo-Doo’(豆豆),她的母亲姓林,是空军基地医院的护士。”拉森回忆道。

2010 年 4 月,拉森在中国拍摄的影集《飞虎队队员眼中的中国 1944-1945》出版,引起轰动,在接受重庆媒体采访时拉森提出,希望能找到照片中的中国女孩豆豆。

一个越洋的洋娃娃

重庆媒体登出“美国飞虎队员的寻人启事”后,反响强烈,各种线索如雪片般飞来,但 4 年后,豆豆还是一个谜,而拉森转眼间即将迎来自己的 90 岁生日。

没人想到,当年的豆豆 70 年后竟然居住在塞外明珠新疆库尔勒,她名叫王智,已经 75 岁,是塔里木

本报记者 程绩 特约撰稿 严湛

70 年后,美国德州,在拉森的 90 岁生日宴上,老照片中的两个人重逢,跨越大半个世纪、跨越大半个地球,再见时,两人都已是两鬓斑白的老人。

物是人非,唯有拉森 70 年前在中国拍摄的 200 多幅彩色照片历久弥新,集结成册后,静静地向后人讲述那段中美人民携手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真实历史。

油田的一名退休工作人员。

本周记者来到库尔勒,见到了王智,当年的女童已经是年逾古稀的老人,她第一次对媒体讲述自己找到拉森的故事。

“2012 年,我二哥从成都来电话说,他在《飞虎队队员眼中的中国》影集里,发现两张我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与一个美国兵的合影”。

“怎么可能是我?”王智自己都不敢相信。“当时我只有 5 岁,我只记得那时家在重庆,妈妈在空军基地医院当护士,唯一的记忆就是自己经常在病房里和美军伤病员玩,但记得曾抱着一个娃娃和一个外国人合影。”

王智的哥哥翻出家里的老照片,其中有一张黑白相片,“我妈抱着我,我抱着个洋娃娃,我穿的衣服和手里的洋娃娃与影集里的那张照片一模一样,这张照片应该是拉森送给我母亲的。”

豆豆就是王智,谜底终于揭开!远在美国奥斯汀的拉森大喜过望,因为这张看似普通的合影背后,是他关于中国战场和中国人最美的记忆,那是战场上另一个温暖的故事,照片中小女孩抱着的洋娃娃还有一段故事。

拉森还在昆明时,他和附近稻田里干活的农民渐渐熟悉起来,村民对这些美国士兵都十分热情,“有

震撼的摄影集”。它不像历史课本中反映抗战时期的黑白历史图片,它没有血腥的战争镜头,而是再现了基层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

在拉森的镜头中,可以看到战争状态下普通民众的乐观,“中国人都非常友好,也乐意让我们拍照,他们相信战争马上就会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拉森回忆说。

在昆明,建于公元 8 世纪的古城墙外,集市非常热闹,老百姓生活有序,通到昆明的滇缅公路街道两旁,商铺林立,尽管城门上写着“还我河山”、“盟军联合到底,共制暴日死命”等战时标语。

在重庆,尽管等来了战争的胜利,但这也并不能改变底层劳工的生活,拉森说自己非常同情“饱受日军不断空袭磨难的重庆市民”,他拍摄重庆市民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领取配给用水;他拍摄朝天门码头拥挤的巷道上抬着贵妇人的挑夫;在庆祝抗战胜利的街头装饰背景衬托下,一个黄包车夫在等待客人,座位上方搭了棚以遮挡阳光。

1945 年 10 月到了杭州,正值秋收,拉森到杭州的农村拍摄农民在田野里耕作,“我还记得 1945 年秋天的气候温和,农民收成都很好。”拉森说。

12 月 4 日拉森到了上海准备登上军舰回国,他来到苏州河边,拍摄抗战初期中日军队激烈交战的战场——四行仓库;在虹口区提篮桥监狱附近,拉森在红砖房子里访问了从欧洲来上海躲避纳粹德国迫害的犹太人。

昆明、重庆、成都、杭州、上海,拉森的镜头由西向东穿越大半个中国,既有在昆明看到的晚清中国的影子,也有 1945 年上海这座“东方巴黎”的现代化景象。让原本感觉灰暗而遥远的抗战末期,忽然像是近在昨天,难怪看到影集的专家学者众口一辞:“太珍贵了!”

(下转 A15 版)